

目 录

第一章 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环境问题：环境社会学的新课题	1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城市生态环境面临的新问题	1
第二节 社会学视阈中环境问题：国内外研究新进展	7
第三节 城市环境问题：环境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新空间	17
第二章 行动者及其环境行为：环境社会学的新视角	21
第一节 理性选择与社会空间：理论分析的基础	21
第二节 行动者、空间与环境行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29
第三节 研究个案的选择与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43
第三章 个人行动者：同为污染者与受害者	52
第一节 经济的发展与居民生活方式的变迁	52
第二节 居民的环境意识：环境问题的新要素	67
第三节 生活者致害者化：城市新污染源的产生	85
第四节 作为受害者的居民：“维权”行动及其环境后果	103
第四章 企业法人行动者：环境成本转移和环境问题外溢	138
第一节 产业结构的变化与都市环境污染	138

第二节	企业污染的治理：在被动与主动之间·····	143
第三节	内部成本外部化：企业收益与社会成本的博弈·····	149
第四节	“先污染,后治理”：有限的合理性·····	171
第五章	政府法人行动者：环境管理的绩效与局限·····	178
第一节	政府的环保权能与环境绩效·····	179
第二节	制度的局限性：环境政策失灵·····	197
第三节	公共性与自利性：双重角色与目标的选择困顿·····	212
第六章	空间、理性行为与城市环境问题：机制与成因分析·····	229
第一节	环境行为与环境问题：形成机制的探讨·····	229
第二节	理性的困境：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	244
第七章	理性与空间的重构：生态城市建设对策的一点思考·····	254
第一节	“生态行动者”的塑造：理论形态与实践选择·····	254
第二节	生态社区及其环保社会力的建构·····	263
附录	·····	279
参考文献	·····	325
后记	·····	338

序

在王芳的博士毕业论文得以通过时，答辩委员们一致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环境社会学专著，并建议出版。此后，王芳博士又对论文的文稿进行了全面的加工与修饰，希望以更悦人的面貌问世。同时，她还请我写序。作为指导教师，为自己的学生作序，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于是我欣然答应了她的请求。然而必须说明的是，我在这里所作的评述——如果算得上是评述的话，也只是近乎外行的一种看法而已。因此，真正的评估，还有待于著作出版后来自同行大家的指点。

外行一说，并非是我的过谦。王芳博士来上海大学深造之前，就已经是一位治学严谨、颇有成就的青年学者。她以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的身份投到我的门下，我也就将这种特殊的师生关系视为校际的学术交流与学者之间的对话。而所谓的指导，大概仅限于我的研究经验和研究方法。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之间原本就因人口的增长而紧张的关系日趋恶化，乃至今天的地球满目疮痍，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然而在此事实面前，存在着两种基本的价值判断，第一种是人类对于自然的臣服，基于对人类遭受自然惩罚的经验认识，持有这一价值判断的人们认为人类的无限贪欲将以毁灭自然为起点，一步步地逼近自身的灭亡。第二种则与此相反，出于对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的崇拜，他们提倡对于自然的征服。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上述两种价值判断已成为

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较量。在这个时候,王芳博士提出的问题无疑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当然,人类对于自己生存环境的探索由来已久,即使是在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环境学研究也已有上百年历史。但将自然环境与社会结构结合起来的环境社会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将城市环境、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等多个变量加以联系的考察为数更少。因此,王芳博士的这一著作可以说是开拓了环境问题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正处于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环境问题日益凸现。鉴于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历史经验,有人认为这是无法逾越的必经阶段。因此目前能够采取的措施只能在两个维度上展开,即一方面尽可能地降低牺牲环境的代价;另一方面是压缩从污染到治理的时间,从而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相对平衡。在此过程中,政策对于企业行为的控制和政府加大环境保护的投入成为两大关注点。可是,就在环保政策逐步完善、政府投入不断加大的条件下,王芳博士注意到城市环境的恶化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而更加严重。于是,她就在对这一悖论的思索中提出了观察城市环境问题的新视角,即从人们的空间意识和环境行为出发来认识环境问题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

如果我的理解不发生错误的话,这本书里的空间意识并不是单纯的三维空间的定位与认识,而是特指空间的社会建构,或者可以简称为社会空间,这就与历史传统和文化变迁勾连起来。通俗地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人们的社会空间是通过个体与他人的关系而建构起来的,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他关于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里描述的那样,以一己为中心,向外不断推延,乃至一表三千里。因此传统社会里的空间是以家、亲属、同乡等活动的范围加以界定的,出现所谓“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

变迁迫使这种社会空间发生变迁,变迁中的最大问题是社会空间的公域化问题,即由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的转化。

公共空间的出现是与社会分工细化、社会结构转型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方面,本书以其特有的敏感和领悟力,将目光转向不同层次的行动者以及他们采取的环境行为策略。透过对个体、企业、政府的环境行为的精湛分析,以雄辩的事实告诉我们,城市的环境问题,正是这些法人行动者的环境行为的结果。因此,本书的一个主旨浮现在读者面前:工业化与城市化并不必然导致环境恶化,这一过程中环境问题的真正成因是社会空间的不同建构和人们环境行为的不协调。有了这样的认识,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见性的政策建议可供选择。而作者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促进我国城市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指导作用。

在方法论上,本书采用的方式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遵循默顿所谓“中层理论”的研究路径,以行动者、社会空间和环境行为三个主要变量构建起来的理论框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中国城市的环境问题。与此同时,本书以某中心城区为研究单位,将田野工作与抽样调查结合起来,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展示了上述变量间的联系,读来令人信服。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尽管著作中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因而也具有进一步改进的张力,但这一著作毕竟以其睿智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前路已经开通,问题已经展开。我衷心希望王芳博士能一如既往,深入下去,并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推出这部专著的续篇。

沈关宝

2007-2-8

第一章 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环境问题： 环境社会学的新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体制的转轨，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然而与这一切相伴生的是中国生态环境状况的日益恶化和由于环境问题所引发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日趋复杂化。我国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变化便印证着这一切。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城市生态环境面临的新问题

一、当今我国城市居民面临的总体环境状况

伴随着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步伐，我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城市居民面临的生态环境状况却日趋恶化，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尽管“九五”期间全国城市环境保护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由于长期以来认识上的不到位和指导思想上存在的偏差，使得我国城市的环境保护工作往往旧的欠账还未还上，又出现新的欠账，始终滞后于其他方面的发展。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每年六月发布上一年的全国环境状况公报，综合近几年来“公报”，当前我国大多数城市的环境污染程度仍处于

相当高的水平,环境污染状况和环境保护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第一,城市水污染十分突出,水环境质量恶化。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生活污水排放量迅速增长,1998年首次超过工业废水排放量。2001年,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为200.7亿吨,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为227.7亿吨,其中生活污水COD(化学耗氧量)排放量比上年增长8%,而同期工业废水COD排放量则减少13.8%。目前,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只有34.3%。城市河道成了纳污沟。大量生活污水直接排放使城市水环境恶化,七大流域城市河段都形成明显污染带,一些城市的饮用水源也受到污染。

第二,以北方城市颗粒物和南方城市酸雨为特征的城市大气污染依然比较严重。全国城市居民燃气普及率只有60.2%,相当多的城市仍以煤炭为主要民用燃料,大量燃煤造成煤烟型污染。二氧化硫浓度年均值达不到国家二级标准的城市占21%。许多城市受到酸雨侵害,2002年,酸雨控制区内90%以上的城市出现了酸雨。城市裸露地面多、建筑施工现场管理不规范、渣土垃圾粗放收运使得城市空气中颗粒物常年居高不下。在全国重点监测的338个城市中,近三分之二的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第三,大城市机动车尾气污染越来越突出。近几年,虽然采取了淘汰含铅汽油、限制汽油中其他有害物质含量、新车采用电喷加三元催化、出台新的排放标准等措施,单车污染物排放量有所减少。但由于机动车数量上涨很快,污染物排放总量仍在增加。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郑州、沈阳等城市氮氧化物污染较重,交通干线两侧一氧化碳严重

^① 参见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站公布的1999~2003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以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汪纪戎2002年8月23日“在全国城市污水和垃圾治理与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超标。部分城市的大气污染类型已经由煤烟型转变为复合型。

第四,固废堆积,垃圾围城。城市垃圾逐年增加,垃圾围城现象日益严重,白色污染问题非常突出。2002年,全国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3638万吨,比上年增加1.2%;其中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为7404万吨,比上年减少5.6%。由于生活垃圾未得到妥善处置,严重影响地表水、地下水的环境质量。工业固体废物污染已成为影响质量的另一严重问题,不仅占用土地,而且污染地下水及水源地,释放有毒有害气体。另外,各城市第三产业、居民生活产生的各类废物混合收集,医疗弃物等特殊废物大多没有专门的集中处理设施,随普通生活垃圾处理或堆放,成为传播疾病和污染环境的隐患。

第五,噪声污染普遍超标,已成为影响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环境问题。交通、社会生活、建筑施工是主要的声污染源。目前,交通对城市噪声污染的贡献率占70%~80%。在开展交通噪声监测的214个城市中,有31.3%的城市处于中度或较重污染的水平。在开展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的176个城市中,有55.6%的城市处于中度或较重污染水平。一些城市在建设高架路桥改善交通状况时,却往往未能很好解决高架路两侧的降噪隔声问题,交通干线两侧居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二、上海建设生态城市的实践及存在的问题

和全国的其他城市一样,改革开放以后,上海跨入了经济社会高速增长的快车道。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市的人均GDP达到了平均两位数的年增长速度。然而,上海的生态环境状况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与挑战。为了实现“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目标,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国际大都市,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上海市政府对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也越来越重视,多次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要求,制定并实施了用于指

导生态城市建设的两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并不断加大对城市环保的投入，为城市生态建设提供资金保障。1992年以来，上海市用于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的资金逐年增加，1992年投资15.2亿元，占GDP的1.36%，2000年则上升到占GDP的3.12%，达到141.9亿元，并且2000年以来上海每年用于改善城市环境的经费都超过100个亿，达到或超过上海GDP的3%（这个数字已接近发达国家在城市环境方面的投入水平）。从1994年开始，上海市区每年新建公共绿地200公顷以上，1999年新建绿地面积达到了512公顷。6年时间里，上海城市公共绿地面积净增了6463.15公顷。上海苏州河里的臭气已经日益消失，久违了的鱼又游荡在河水中。上海的空气比以前好了，天也比以前蓝了。

然而，无法回避的是尽管上海市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控制环境污染，取得的成效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同国内外先进城市相比上海的城市环境仍然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就现状而言，上海环境保护上的大投入仅仅是部分地改善了环境，而另一些环境问题却比以前更加严重、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1）水质污染十分严重。据有关研究部门报告，上海的生活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加，从1999年开始，已超过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占到城市废水排放量的58%。由于其中大部分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排放，因此对上海的河道造成了严重污染，目前上海52.5%的河道黑臭，甚至已经涉及了长江口。再加上传统工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所产生的废水的“贡献”，使得尽管据估算上海的水体总蓄水量约5亿立方米，但受污染的水体容量已达到70%，上海已成为水质型缺水城市；（2）城市绿化建设相对明显滞后（绿化分布不均，配比失调，缺乏群落规模效应），但侵占绿地、毁坏绿化的事件却屡有发生；（3）大气质量依然较差，且改善工作非常艰巨；（4）交通、施工、生活噪声等污染十分突出，由此引发各种社会矛盾与

冲突不断；(5) 生活污染分量不断加重，垃圾围城、公共场所污染问题突出等等^①。

三、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双重关系的失调：环境问题的社会危害

包括上海在内的日趋严重的中国城市环境问题，在使城市居民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的同时，也给人们生存的社会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一方面，城市的环境污染，给人们的身体健康、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据有关专家学者的统计，由于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中国的大城市每年有 17.8 万人夭折，相当于城市地区死亡总人数的 7%；沈阳、上海等主要城市接受调查的儿童血液中的平均铅含量超过临界水平 80%；大气污染致病每年损失 740 万天工作日。水污染使得很多河流的水质连灌溉标准都达不到，成千上万的城乡居民的生活饮用水源遭到威胁。在浙江，由于饮用水的污染问题导致肠癌死亡率是正常水平的 5~8 倍，在沈阳和抚顺的废水灌溉地区，内脏感染和肝肿大的发病率比其他地区分别高出 49% 和 36%，这些地区的癌症病人是正常情况下的 2 倍。

另一方面，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也给社会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损失。有关研究表明，环境恶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惊人的，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损失相当于中国 GDP 的 3.5%~8%，并且这一估计还没有包括那些诸如由于旱、涝和长期缺水而引起的地表庄稼的损失、农业生产产量的减少等花费高的项目，以及对无价资产不可挽回的破坏造成的其他诸多影响等^②。

^① 沈国明、诸大建主编：《生态型城市与上海生态环境建设：2001 年上海环境建设蓝皮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 21 世纪的中国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年版；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中国人发展报告 200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年版。

此外,在转型加速期的中国城市社会,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引发的人与人之间或不同群体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也在不断加剧。环境问题所反映出的已不仅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同时也越来越反映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失调。

据 2002 年 1 月 5 日的《中国环境报》报道:湖南省株洲市 137 名污染受害者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污染者株洲某水泥厂——一家被当地媒体称为“招商引资”救活的企业停止侵害,但遭到败诉。由于与污染企业和相关部门“理论”受阻,导致受害者发生了过激行为,最终 3 名原告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批捕。与此相类似,在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环境问题的发生过程中,不断产生着环境问题制造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矛盾;在环境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也常常会发生环境问题解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冲突、受益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冲突以及解决者与受益者之间的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加上思维定式、行为习惯和利益格局的制约,既妨碍了环境问题的解决,也引发了局部社会失序乃至混乱,破坏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再以上海的情况为例,尽管上海每年都增加用于整治环境的费用,上海的住房条件与社区环境也在不断改善,按常理想象,上海居民对环境的满意程度应该不断提高。但事实恰恰与常理相反。近年来,上海居民对环境问题的抱怨越来越多,上海市因环境污染发生纠纷进而进行上访和投诉的案件也在不断攀升,近 10 年几乎增长了 10 倍,2003 年已达到了 7.6 万件以上^①。

为什么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城市的许多环境问题却反而越来越突出?人们对环境状况也反而越来越不满意?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矛盾冲突、上访投诉也不断增多?这些问题令我费

^① 资料来源:1993~2002 年《上海市环境状况公报》,上海市环保局档案资料,2003。

解,也让笔者思考。改革开放以后,环境保护被列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而日益得到国家和政府部门的重视,近十多年以来,城市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学术界同仁、政府官员和普通居民关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了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历届上海市政府都把解决城市环境问题、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列为十分重要的“实项目”。但现在,在谈到2008年即将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和2010年即将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时,令人们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还是城市环境问题。城市的环境问题为什么那么难解决?为什么会出现上述似乎有悖于常理的情况?是不是我们以前对于城市环境问题的理解有所偏颇,而没有真正发现导致城市环境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不是我们没有掌握城市环境问题的内部机制,从而不可能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制定出符合实际的环境政策,采取切实有效的治理环境措施?要改善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城市的环境质量,在政府投入、技术治理之外,我们到底还缺少些什么?

这些问题是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城市环境状况的改善和环境问题的解决所面临的亟须解决的问题,迫切地需要学术界进行多学科、多层面的深入研究,也激发了我作为一名社会学学者从社会学的视角对此开展研究的浓厚兴趣。

第二节 社会学视阈中环境问题： 国内外研究新进展

本书的研究缘起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因而具有比较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但作为学术研究而言,又必须回到学术史中以明确自己研究所在的位置。本节笔者将对国内外围绕环境问题开展的社会学研究进行简要的梳理,以作为后文分析的基础。

一、西方环境社会学的兴起、发展及其主要研究

1. 西方环境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中叶西方八大公害事件的出现,标志着环境问题已发展到威胁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程度。在处理环境问题的实践中,人们逐步认识到环境问题只靠发明一些新的治理措施、关闭一些污染源或发布一些新法令是解决不了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根植于更深层的人类改革中,它包括对经济目标、社会结构和民众意识的根本变革^①。也就是说,人类终于认识到,环境问题也是一个发展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涉及人类社会文明的问题。人们必须在各个层次上去控制人类的社会行为和改变支配人类社会行为的思想^②。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和社会背景,70年代以来,西方环境社会学应运而生。作为社会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环境社会学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发展迅速,并日益凸显出其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成为社会学的新的发展方向之一。

西方环境社会学最早始于70年代后期的美国,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创、停滞(或称过渡)和复兴三个阶段^③。美国社会学家卡顿和邓拉普发表的题为《环境社会学:一个新范式》的文章是环境社会学创立的标志。在该文中,卡顿和邓拉普不仅反思了自杜尔克姆以来所形成的社会学中“社会事实必须用社会事实去解释”这一正统观念,同时指出环境因素同样也很重要。而且他们在该文中指出,“各种社会学理论尽管表面上分歧对立,但都具有人类中心主义这一共同点”,并将传统

① [美] 查尔斯·哈珀著,肖晨阳等译:《环境与社会——环境问题中的人文视野》,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张坤民主笔:《可持续发展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 Dunlap, R. E., and Catton, W. R. J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79, 5. Dunlap, R. E., and Catton, W. R. Jr., “Struggling with Human Exemptionalism: The Rise, Decline and Revit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st*, 1994, Spring.

社会学所使用的“范式”概括为“人类例外主义范式”(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 HEP),认为这种范式不利于认识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和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同时,卡顿和邓拉普根据人类社会对环境的依存性这一前提,提出了与传统社会学范式相对的、能够指导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即“新环境范式”(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NEP)。构成这一新范式的基本假设为:① 社会生活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生物群落构成的,人类只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② 复杂的因果关系及自然之网中的复杂反馈,常常使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③ 世界是有限度的。因此,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都存在自然的和生物学上的潜在限制^①。卡顿和邓拉普的HEP-NEP模式直到今天仍然是环境社会学领域最有影响的理论。

2. 西方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理论研究成果

西方环境社会学诞生以来,学科发展相当迅速,并日益显现其理论与应用价值。经过20多年的发展,西方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已涉及以下几个方面:① 环境研究的伦理标准、概念和方法;② 对环境问题的描述;③ 环境污染的影响;④ 环境立法;⑤ 环境政策;⑥ 环境管理;⑦ 环境意识与行为;⑧ 环境运动;⑨ 环境犯罪;⑩ 环境教育;⑪ 环境与信息^②等。

随着学科的发展,环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先后产生了众多的学派和理论,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采用社会学常用的类型学方法,迄今为止的环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为环境学的环境社会学和社会学的环境社会学两种类型^③。

① Catton, W. R. Jr., and Dunlap, R. E.,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 New Paradigm",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1978, 13.

② 塞尔·J:《技术、生产、消费与环境》,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5年第2期。

③ 洪大用著:《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所谓环境学的环境社会学,主要以环境与社会的关系为研究主题,采用自然科学如生态学和系统科学的一些分析方法或分析框架,在对传统社会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以一种宏观的研究取向,试图发展具有普适性的、关于理解环境与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这种类型的研究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邓拉普和卡顿以及吉尔贝托·C·加洛潘、巴勃罗·古特曼和埃克托尔·马莱塔等人。

邓拉普和卡顿认为,环境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环境与社会间的相互作用,并在一系列文章中阐述了环境社会学的生态学分析框架^①。他们吸收、综合并修正了帕克提出的“社会复合体”模型^②和邓肯提出的“生态复合体”模型^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环境的三维竞争功能模型”概念,通过分析环境对于人类的三种功能(提供生活空间、提供生存资源、进行废物储存和转化)、三种功能之间的冲突关系以及这些功能与关系的演变情况,解释了当代环境问题的生存根源。

加洛潘等人则使用了系统研究方法来研究环境与社会的关系。他们认为,环境社会学主要应当研究自然生态系统的一系列人为活动以及影响社会系统的一系列自然产生的生态效应。对于这种研究,他们提出了一种与一般的系统论观点不同的系统研究方法。他们认为,社会—生态系统最好是看作一套因果轮回和有待提出的问题,而不是看作一套子系统。如此,会更具有适用性和灵活性,“能将要研究的变量或过程逐步组织起来,并且指导今后按不同的情况将系统分解成有关

① Dunlap, R. E., and Catton, W. R. J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79, 5; Dunlap, R. E., and Catton, W. R. Jr., “What Environmental Sociologists Have in Common?” *Sociological Inquiry*, 1983, 53.

② Park, R. E., “Human Ec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6, 42.

③ Duncan, O. D., Human Ec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in P. M. Hauser and O. D. Duncan (eds.), *The Study of Popul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Duncan, O. D., “From Social System to Ecosystem”, *Sociological Inquiry*, 1961, 31.

的子系统”。依此，他们在文章中详细探讨了环境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具体策略及其过程^①。

所谓社会学的环境社会学，是将环境问题作为一个比较独立的分析对象，主要围绕环境问题及其社会影响而开展研究。他们主要采用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和传统社会学如社会冲突分析和社会建构分析的一些方法或分析框架，试图发展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关于理解环境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的特殊理论。这种类型的研究不仅采用大量的社会学理论和概念，而且也直接运用社会学研究的一些具体方法，如统计调查和实地观察等方法。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更具有社会学分支学科的色彩，更易为主流社会学所接纳。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史耐伯格和汉尼根。

史耐伯格建立了环境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模式。这一解释模式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环境衰退的主要社会根源是什么？究竟谁应该对环境破坏负责？史耐伯格在吸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韦伯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基础上，预设了“社会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并提出了“生产的转动机制”（treadmill of production）概念，并以此分析了经济扩张和环境破坏之间矛盾关系的起源，论述了资本主义、政府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按照史耐伯格的观点，环境问题和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是在“生产的转动机制”的现代工业社会结构中构成的；通过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增长以“解决”经济扩张与生态破坏之间的对立关系，是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根本原因；通过维持或达到适度经济扩张的同时，处理某些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的做法，在根本上无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严格限制或放慢经济扩张，以求仅仅利用可再生资源维持生产与消

^① 吉尔贝托·C·加洛潘、巴勒罗·古特曼、埃克托尔·马莱塔：《关于全球性贫困、持久发展和环境问题的理论研究方法》，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0年第3期。

费,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之策^①。

汉尼根则是以建构主义视角来研究环境问题。他撰写的《环境社会学——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是第一本直接以“环境社会学”为标题的著作,并用副标题直接说明了其建构主义的研究取向^②。汉尼根认为,公众对于环境的关心并不直接与环境的客观状况相关,而且,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关心程度在不同时期也不一定一致。环境问题只有在经过个人或组织的“建构”,并被认为是令人担心且必须采取行动加以应付时才构成问题。他同时认为,科学和大众传媒在环境问题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汉尼根还进一步指出了成功地建构一个环境问题需要的六个因素,即:一个环境问题主张必须具有科学权威性和合法性;有能在环境主义和科学之间进行普及、沟通的“大众使者”;预期中的环境问题必须受到媒体的关注;以形象化和视觉化的语言对问题进行修饰处理;对环境问题采取积极行动必须有可见的经济刺激;有能够确保环境问题建构合理性和持续性的制度化的赞助者^③等。

二、国内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概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环境问题日益加剧的状况,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不少学者开始投身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有学者在对这些研究进行总结之后指出,社会转型期,我国

^① Schnaiberg, A., Social Syntheses of the Societal-Environmental Dialectic: The Role of Distributional Impact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975, 56. Schnaiberg, A., *The Environment: From Surplus to Scar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② 汉尼根并不是采取建构主义视角研究环境问题的第一人。其他一些环境社会学家如巴特爾和泰勒(Buttel and Taylor)、福克斯(Fox)、安嘎(Ungar)以及马卓和李(Mazur and Lee)等人,也都在环境问题研究上采用了建构主义视角,但汉尼根对建构主义视角及环境问题的建构过程的阐述最为系统。

^③ Hannigan, J. A.,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